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 对非洲政策探析

胡 舶 李 沛 奇

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非洲大陆被视作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二战结束后，尽管苏联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持保留态度，但随着英国、法国等殖民大国衰退以及众多新独立非洲国家涌现，苏联逐渐加强了对非洲的战略关注。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对非增加军事援助、强化与非洲社会主义政党及武装团体的联系，甚至直接干预非洲国家的内政，以期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然而，非洲事务在苏联的外交政策中优先级较低，更多是苏联与西方博弈的筹码。苏联这种以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导向的政策不仅加剧了非洲的不稳定局势，也给苏联经济带来了沉重负担，最终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 苏联 勃列日涅夫时期 非洲政策 地缘政治

作者简介 胡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安 710119）；李沛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西安 710119）。

自近代以来，非洲大陆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辽阔的地域以及独特的战略地位，备受西方列强青睐。相比之下，俄罗斯在非洲事务中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处于次要地位。^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崛起为超级大国，此时恰逢非洲大陆涌现出强烈的反殖民运动。为了与西方相抗衡，并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开始涉足非洲事务，积极与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广泛提供军事与经济援助。^② 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综合国力显

① Robert Patma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Horn of Africa: The Diplomacy of Intervention and Disengag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5 – 26.

② 黄天堂：《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在第三世界地区的外交政策》，《苏联东欧问题》1990年第2期，第61页。

著提升，而美国则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战略收缩态势，形成“苏攻美守”的局面。在此背景下，苏联对非洲的援助规模相较于赫鲁晓夫时代呈几何倍数增长，^① 援助重心明显偏向军事领域，这在客观上加剧了地区冲突。此外，苏联在安哥拉内战中派遣古巴雇佣军干预其内部纷争，以及在欧加登战争中先后支持敌对的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这些行为均显露出这一时期苏联对非政策中的干涉主义与利己主义成分。^② 这种策略不仅给苏联经济带来沉重负担，而且收效甚微。许多非洲国家也因采用不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而走了弯路。^③

学界已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洲外交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苏联外交部陆续发布了有关苏联与非洲关系的文件集，这些文件集以官方视角记录了冷战时期苏联与非洲的交往历程。^④ 随着苏联解体，大量涉及苏联与非洲外交关系的原始档案被解密。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欧美冷战史学者基于这些解密档案，撰写了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深入探讨苏联在非洲之角冲突中的角色，^⑤ 及其在安哥拉内战中的立场。^⑥ 部分学者还从美苏冷战

-
- ① Gu Guan-fu, "Soviet Aid to the Third World, an Analysis of Its Strategy," *Soviet Studies*, Vol. 35, No. 1, 1983, pp. 72 - 74.
- ② 刘金质：《试论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政治研究》1986 年第 4 期，第 46 页。
- ③ 顾志红：《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反思与调整》，《苏联东欧问题》1991 年第 4 期，第 20 页。
- ④ 20 世纪 60 年代出版的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СССР и страны Африки 1946-1962 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 Госполитиздат, 1963;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СССР и страны Африк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63-1970 гг.: 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1 (1963-1966 гг.)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2;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СССР и страны Африк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63-1970 гг.: 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2 (1967-1970 гг.)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2;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СССР и страны Африк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71-1976 гг. В 2-х ч. Часть 1 (1971-1974 гг.)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5;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СССР и страны Африк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71-1976 гг. В 2-х ч. Часть 2 (1975-1976 гг.)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5.
- ⑤ 代表性文献: Harry Brind, "Soviet Policy in the Horn of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0, No. 1, 1983, pp. 75 - 95; Robert Patma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Horn of Africa: The Diplomacy of Intervention and Disengagement*, p. 5;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57.
- ⑥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学者特别关注古巴在安哥拉内战中的作用，参见 Natalia Telepneva, *Cold War Liberatio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frica, 1961-1975*,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22; Piero Gleijeses, *Conflicting Missions: Havana, Washington, and Africa, 1959-1976*,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Edward George, *The Cuban Intervention in Angola, 1965-1991: From Che Guevara to Cuito Cuanavale*, Frank Cass, 2005.

的大背景出发,就苏联对非洲外交政策进行全面分析。^①然而,中国学者通常将这一时期苏联对非政策纳入苏联与第三世界关系的总体框架内进行研究,因此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略显不足。^②本文旨在结合俄罗斯最新解密档案和国际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从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政策的历史背景、动机、实施情况及其利弊四个方面,全面梳理这一时期苏联对非政策的内外逻辑,并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进行客观评价。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政策的历史缘起

传统而言,俄国在非洲事务中并非显著的利益攸关方,这主要源于其受地处北方内陆、邻近海域相对封闭和割裂的地理环境约束,同时也受制于它当时较为落后的经济水平。自苏伊士运河通航以来,英、法等国纷纷加强对非洲大陆的侵略和渗透,然而直至1871年,俄国在苏伊士运河通航国的排名中仍位列第八,这与当时它在欧洲仅次于英、法的强国地位形成鲜明反差。在1884年柏林会议上,非洲大陆几乎被欧洲列强瓜分完毕,尽管俄国作为列强之一参加了会议,但未获得任何领土,并在随后的近80年中失去了在非洲扩张的机会。^③总体来说,除了19世纪末俄国与同属东正教的埃塞俄比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交流,^④以及共产国际在非洲支持了一些成效有限的革命活动外,^⑤二战前的俄国及苏联并未在非洲形成有效且持久的影响力。

二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掀起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浪潮。此时,英法两国因战争损耗已无力维系在非洲的殖民统治,而苏联的影响力在战后迅速扩大,成为拥有强大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超级大国。然而,面对英、法撤离非洲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战后初期的苏联在斯大林“两个阵营”理论指

① Sue Onslow (ed.), *Cold War in Southern Africa: White Power, Black Liberation*, Routledge, 2009; Sue Onslow and Anna – Mart van Wyk (eds.), *Southern Africa in the Cold War, Post – 1974*,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2013; Vladimir Shubin, *The Hot “Cold War”: The USSR in Southern Africa*, Pluto Press, 2008.

② 刘金质:《试论苏联对第三世界的政策》,第40—47页;顾志红:《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反思与调整》,第18—23页;张英姣、孙启军:《论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第三世界扩张的后果》,《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第188—192页。

③ 艾周昌、郑家馨主编:《非洲通史·近代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

④ Robert Patma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Horn of Africa: The Diplomacy of Intervention and Disengagement*, pp. 27 – 30.

⑤ 彼时共产国际在非洲的重点集中在工业相对发达、工人阶级力量相对强大的南非,参见С. В. Мазов, А. Б. Давидсон (Отв. ред.), *Россия и Африка.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XVIII в. – 1960 г. XVIII в. – 1917 г.*, с. 67 – 184.

导下，对非洲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抱有极大的不信任感，将他们视为资产阶级甚至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舔食者和走狗”^①。未明确声援社会主义的非洲领导人往往会被视为帝国主义的支持者。此外，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苏联也持否定态度。^② 在这种教条、僵化的意识形态下，苏联对非洲的独立运动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随着赫鲁晓夫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上台，对斯大林主义的全面反思与批判在苏联广泛展开，这为苏联官方更具创造性和灵活性地解读非洲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随着大量亚非拉国家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取得独立，赫鲁晓夫认识到，在东西方阵营以外，中立阵营逐渐扩大。为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声誉、提升苏联在非洲的形象、保障能源供应以及控制海上战略通道，苏联积极对非洲国家开展外交攻势，以此对抗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美国及其盟国相比，苏联在非洲开展外交活动具有比较优势，这些优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③

（一）苏联没有殖民非洲的历史包袱

历史上，俄国及苏联并未在非洲建立过持续性的殖民统治，相反它曾支持埃塞俄比亚抗击意大利的侵略。^④ 1935 年 10 月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时，苏联在大国中率先立场鲜明地谴责意大利的侵略行为，并呼吁对意大利实施坚决的制裁，^⑤ 这与西方殖民大国表现出的犹豫和迟疑形成鲜明对比。这种立场让刚摆脱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对苏联产生了亲近感，这种亲近感又极大地促进了苏联对非政策的实施。1960 年，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起并推动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Granting of Independence to Colonial Countries and Peoples*），为非洲各国实现民族独立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法支撑。同时，苏联对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罗得西亚和南非政权持续进行批判，这一立场赢得了非洲特别是南部非洲国家的广泛赞誉。至 20 世纪 60 年代末，苏联已与 29 个非洲

① Robert F. Gorman, "Soviet Perspectives on the Prospects for Socialist Development in Africa," *African Affairs*, Vol. 83, No. 331, 1984, p. 170.

② Robert F. Gorman, "Soviet Perspectives on the Prospects for Socialist Development in Africa," p. 170.

③ 关于苏联在非洲的外交优势，参见 Helen Desfosses, "The USSR and Africa," *Issue: A Journal of Opinion*, Vol. 16, No. 1, 1987, p. 6; Michael E. Latham, "The Cold War in the Third World, 1963 - 1975," in Melvyn P. 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vol. 2): Crises and Déten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76.

④ 谢晶晶：《苏联对“非洲之角”的政策（1974—1978）》，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14 年，第 7 页。

⑤ Robert Patma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Horn of Africa: The Diplomacy of Intervention and Disengagement*, p. 32.

国家建立双边外交关系,^①极大地拓展了其在非洲的活动空间。

(二) 苏联的经济援助更具战略性

苏联对非洲援助更多基于地缘政治考量,而非仅仅追求经济利润。1956年,赫鲁晓夫提出著名的“三和”路线。^②鉴于非洲社会尚处于部落阶段,还未出现阶级分化,呈现出“原始共产主义”的特征,赫鲁晓夫认为通过向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可以帮助它们跨越阶级社会的发展阶段,直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成为苏联的坚实盟友。^③为此,赫鲁晓夫指派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首任所长伊万·波捷欣(Ivan Potekhin)带领一个考察团,于1957年访问加纳、马里、几内亚等国,他们回国后的报告也证实了赫鲁晓夫的看法。^④

在这种战略思维的指引下,苏联首先选择向具有明显社会主义倾向的非洲领导人及其国家提供援助。为实现让这些国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目标,苏联对非洲的援助优先选择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成本回收速度慢的重工业项目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因风险较高而不被西方政府及投资者看好,或因政治原因被搁置甚至取消。同时,非洲国家本身缺乏相应的资金储备和技术人才,苏联介入客观上解决了它们的燃眉之急,使许多受援国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对苏联抱有感激之情。例如,埃及总统纳赛尔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感谢苏联为阿斯旺水坝项目提供贷款,称此举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产生了巨大反响,使人民将苏联视为自己的朋友。^⑤

(三) 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对非洲更具吸引力

俄国在历史上并未跻身于工业发达国家之列。然而,在斯大林长达29年的领导下,苏联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无疑为新独立的非洲国家起到良好的示范效果,促使众多非洲领导人赞赏社会主义制度。同时,由于众多非洲国家的边界实际上是由西方国家划定的,所以国家内部存在民族、宗教、习俗等多方面的

① 数据来源于 В. Г. Солодовников – ЦК КПСС. Записка «Причины и урок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переворотов в Африке», 22 марта 1966г, РГАНИ. Ф. 5. Оп. 50. Д. 766. Л. 276 – 307. Цит. по: С. В. Мазов, А. Б. Давидсон (Отв. ред.), *Россия и Африка.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1961 – начало 1970 – х.* 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21, с. 111 – 127.

② 指苏联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竞赛”,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和平过渡”。

③ Gu Guan – Fu, “Soviet Aid to the Third World, an Analysis of its Strategy,” p. 71.

④ Natalia Telepneva, *Cold War Liberatio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frica, 1961 – 1975*, p. 19.

⑤ 《纳赛尔致赫鲁晓夫的信》,载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33页。

差异。如何构建民族共同体，避免国家陷入分裂与解体的困境，成为这些非洲国家在社会治理领域面临的重大考验。在此情境下，以政治集中性高，意识形态超越民族界限，以及社会动员能力强为特点的苏联模式，似乎为非洲国家提供了解决迫切问题的有效方案，也因此成为非洲领导人治国的重要理论参考。

总体而言，勃列日涅夫之前的苏联与非洲关系表现出间接性特征，其交往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文化两大领域。但这种相对疏离的关系使非洲各国在与苏联交往中往往抱有美好幻想，视苏联为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天然盟友。它们认为苏联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是出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阶级感情，效仿苏联模式被视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国族认同强化的理想途径。然而，随着苏联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战略投送能力提升，其在非洲的利益触角逐渐扩大。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尽管苏联在官方层面仍然打着“反殖反霸”的幌子，但其对非政策中干涉主义、利己主义本质，已通过公开或已解密档案所记录的隐蔽行动而更加清晰地暴露出来。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政策的主要动机

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相较于赫鲁晓夫时代，均实现了显著跃升。同时，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后期的国际环境，也为苏联在非洲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期间，美国正深受“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的双重困扰，美国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仍然偏低，美国国内的种族主义问题也给非洲国家留下负面印象。^① 因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对非政策，相较于斯大林的怀疑和警惕，以及赫鲁晓夫的经济援助与政治声援，更加注重输出意识形态和提供军事援助。^② 苏联积极介入非洲国家内部以及国家间的外交争端和领土纠纷，力图将更多已独立或即将独立的非洲国家纳入其势力范围，以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在非洲的影响力。在这一外交思想的指导下，苏联先后介入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国的内部纷争，并在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边境冲突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勃列日涅夫对非洲事务的深入干预，苏联在非洲的影响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非洲各国乃至地区秩序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① “Memorandum from Samuel Huntingt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in Louise P. Woodroffe (ed.),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ume XVII, Part 2, Sub – Saharan Afric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Washington, pp. 5–8.

② 关于苏联对非洲军事援助情况，参见 Gu Guan – Fu, “Soviet Aid to the Third World, an Analysis of its Strategy,” p. 74.

在这一时期，苏联对非政策的主要动机展现出多元且具备选择性的特点。^①鉴于非洲各国在历史传统、民族构成、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苏联往往会根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政策。例如，针对石油和钻石资源丰富且社会主义基础稳固的安哥拉，苏联主要致力于协助执政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巩固政权，压制由美国、南非资助的反对派武装，以实现将刚果到莫桑比克等遵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国家连成一线的战略目标。^②对于非洲之角地区的介入，则更多地出于控制红海—亚丁湾这一战略要冲，进而把控海上战略通道的考量。尽管在具体策略上存在差异，但这些行动背后都蕴含着共同目标。

（一）传播意识形态

依据“世界革命”理论，苏联积极向外输出共产主义制度。但相较于西方国家，苏联在面向非洲国家传播意识形态方面稍显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苏联在非洲的影响力。为改善这一状况，苏联积极在经济、军事、教育、医疗、意识形态等领域为非洲国家的马列主义政党及亲苏武装力量提供支持。一旦这些势力上台执政，苏联即致力于协助其改造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以符合苏联模式。

1976年2月，苏联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安东尼奥·阿戈什蒂纽·内图（António Agostinho Neto）在武装占领首都罗安达并当选总统3个月后，宣布了安哥拉的发展纲领，即指引安哥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③对此，勃列日涅夫对内图表示高度赞赏：“这是国际主义的胜利，也是进步力量的国际声援的胜利。”“安哥拉事件再次证实了我们时代的伟大真理：因国际主义声援而倍增的人民捍卫自由的决心，是不可战胜的力量。”^④索马里的情况也颇为类似。1969年索马里陆军少将西亚德·巴雷（Siad Barre）发动政变，他出任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政府总理，并开始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到1974年，在苏联的协助下，巴雷建立了索马里革命社会主义党（Somali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Party），

① 关于这一时期苏联对非政策的动机，参见 Henry Bienen, “Perspectives on Soviet Intervention in Afric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5, No. 1, 1980, pp. 29–42; Robert D. Grey, “The Soviet Presence in Africa: An Analysis of Goals,”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2, No. 3, 1984, pp. 511–527.

② 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48—549页。

③ 《兹韦列夫关于安哥拉形势给国内的政治信函》，载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④ 《在招待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主席、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总统安东尼奥·阿戈什蒂纽·内图的宴会上的讲话》，载《勃列日涅夫言论》第十二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79页。

并在党纲中载明：“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最高革命委员会以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利用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满怀信心地引导国家沿着业已选择的道路前进。”^①

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联对非洲的意识形态渗透策略是极其失败且不负责任的。在输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苏联并未充分考虑非洲各国相对落后的社会现实，将不符合国情的社会制度强加于非洲人民，这不仅导致一些国家政局动荡，同时也使这些国家经济失调，它们因此错过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接受产业转移的宝贵机遇。随着经济结构日益僵化，经济形势日趋严峻，这些国家最终不得不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二）牟取经济利益

尽管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有了显著增长，但与资本主义阵营相比，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显然无法相提并论。苏联对于世界市场的最初构想源于斯大林时期的“两个世界市场”理论。^② 依据此理论，苏联在战后初期将对外贸易的重点聚焦于社会主义阵营内的兄弟国家，这极大地限制了其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与水平。^③ 进入赫鲁晓夫时代，尽管苏联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有所发展，但这种贸易始终服务于同西方进行“和平竞争”的战略目标，苏联旨在通过这种贸易取得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信任，使它们与西方阵营疏远。赫鲁晓夫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们最不看重贸易的经济因素，而最重视其政治因素，因为它是一种促进国家间更好关系的手段。”^④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国际贸易深入发展及国际分工日益深化，苏联认识到封闭政策已不利于经济发展，同时意识到其经济实力尚不足以与西方抗衡，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对于推动经济进步、改善其面临的劳动生产率停滞、技术水平落后、资本短缺等困境具有重大意义。为此，苏联渴望与自然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的非洲国家优先建立联系，并试图将其纳入社会主义阵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苏联先后与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和摩洛哥等国签订“资源换贷款”协

① 《苏驻索马里大使馆关于索马里革命的报告》，载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3 卷，第 81 页。

② 所谓“两个世界市场”，即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国家的市场和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阵营国家的市场，参见 G. Маленков, Отчетный доклад XIX съезда партии о работ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ВКП(б), 5 октября 1952, Москва, с. 16 – 17.

③ Gu Guan – Fu, “Soviet Aid to the Third World, an Analysis of Its Strategy,” p. 85.

④ Gu Guan – Fu, “Soviet Aid to the Third World, an Analysis of Its Strategy,” p. 84.

定。^①但由于苏联本身并不缺乏自然资源，直接大规模收购非洲国家的矿产资源或拿下矿产开采权并非最优选择。因此，苏联更倾向于采取更为隐蔽与复杂的方式，即通过鼓励非洲国家向西方阵营出口矿产，并将所得利润中的大部分用于向苏联购买廉价武器，再用武器销售所得从西方购入粮食、技术产品等“硬通货”。^②在这一“贸易三角”中，苏联不仅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还通过武器输出实现了与非洲国家的政治绑定，可谓一举两得。

（三）遏制西方阵营

勃列日涅夫曾在多个重要场合中，反复强调苏联对非政策的基石是所谓的“国际主义原则”，但他在欧加登冲突中的政策转向，削弱了这一说法的可信度。欧加登地区作为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之间的争议领土，尽管居住着 200 万索马里游牧民，但在行政上属于埃塞俄比亚。1974 年 9 月，埃塞俄比亚发生军事政变，亲苏的军方领导人门格斯图掌权，并决定推行社会主义制度。随后，在苏联军事援助下，索马里总统巴雷于 1977 年向欧加登地区发起全面进攻，意图通过武力手段吞并欧加登地区。由于军队主要由苏联教官训练并装备了苏制武器，索马里在战争初期进展顺利。埃塞俄比亚向苏联求助并要求其制止索马里军队的进攻。在斡旋无果后，考虑到埃塞俄比亚的战略重要性，苏联做出戏剧性的政策调整，不仅将原本驻扎在索马里的约 1000 名军事顾问调往埃塞俄比亚，还派遣古巴雇佣军参与对索马里的作战行动，最终导致索马里战败。

事实上，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非洲政策完全以自身战略利益为导向。在“苏攻美守”的战略背景下，苏联的主要考量在于如何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控制战略交通要道，进而实现对西方阵营的有效遏制。正如 1978 年 2 月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在电视讲话中所言：“非洲之角地区首先具有军事—政治经济意义。这一地区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处在亚非两大洲的结合部，在波斯湾和印度洋中有许多优良的海港，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一地区有把生产石油的国家同美洲和欧洲联系起来的海上航线。”^③因此，对于非洲国家内部的领土纠纷及其他各类矛盾，苏联要求这些国家不应仅从民族利益出发，而应基于

① Gu Guan - Fu, "Soviet Aid to the Third World, an Analysis of its Strategy," p. 87.

② 关于这种隐蔽的“三角贸易”，参见 Robert D. Grey, "The Soviet Presence in Africa: An Analysis of Goals," p. 515.

③ 惠凯：《飞翔在非洲之角上空的北极熊——1977 年苏联战略大空运》，《航空世界》2013 年第 1 期，第 64—67 页。

“国际主义原则”从巩固进步力量的立场行事。^①面对社会主义阵营内如索马里这样的“麻烦制造者”，苏联采取了果断的惩戒措施。这足以表明，苏联所谓的“国际主义原则”，本质在于无视非洲各国利益，将非洲国家作为与西方阵营博弈的棋子。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政策的具体表现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虽在美苏争霸中占据攻势地位，但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层面明显落后于资本主义阵营，这一现实制约了苏联在非洲事务中的介入深度与规模。同时，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尚未成熟，主要通过对外出口矿产资源赚取外汇，因而对西方市场存在强烈的依赖关系。在政治层面，非洲国家普遍存在民族、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政权更迭频繁，这些主客观因素均对苏联的非洲战略构成不利影响。鉴于以上形势，苏联在非洲事务的干预策略上采取了扬长避短的方针，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军火输出为突破口

尽管苏联在多数产业领域落后于西方，但其在军事工业领域的实力不容忽视。作为一个拥有完整军工产业链的军事强国，其武器装备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具有相对优势，军火贸易在苏联与非洲贸易往来中也占有极大比重。与西方武器相比，苏制武器以操作简便、价格适中及耐用性强的特点，在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中颇受欢迎，成为苏联在世界市场中少数具备较强竞争力的商品之一。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对非洲国家的军火出口呈显著增长趋势。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前的十年（1955—1964），苏联向非洲出售的军火总额达到 7.35 亿美元；在其执政的前中期（1967—1976），这一数值提升至 44.16 亿美元；而在随后的五年（1976—1980），军火出口更是激增至惊人的 113.2 亿美元。从购买军火的国家来看，1967—1976 年，埃及因处于第三、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成为苏联在非洲最大的军火购买国，而安哥拉、索马里则分别位列第四和第五。1976—1980 年，埃塞俄比亚跃升至第二位，安哥拉、索马里分别保持第四和第

^① 《伊利乔夫与卡西姆第二阶段的会谈记录》，载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33 卷，第 155 页。

八的位置，而埃及则退居第十八位。^① 这一变化与地区局势演变及苏联对非洲各国态度的改变相吻合。^②

显然，向非洲国家出口武器，进而影响地区局势，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加强对非洲影响力的重要策略。这一策略的实施，不仅极大地冲击了地区原有的安全格局，还加剧了地区冲突的烈度。同时，部分国家为偿还因购买武器而产生的债务，不得不挪用原本用于民生改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从而加剧了贫困恶性循环。

（二）进行代理人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古巴雇佣军在此阶段对苏联的非洲战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堪称苏联在非洲的“外科手术刀”。从安哥拉到纳米比亚、由埃塞俄比亚至索马里，古巴战士的身影遍布非洲大陆。在最高峰时，古巴武装部队的 1/4 都投身于非洲军事行动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古巴国内人力资源紧张。^③

可以说，古巴政府的决策中包含了理想主义因素以及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正如挪威冷战史学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所言，其行动“是对美国威胁古巴的一种前沿防御”^④。然而，古巴的主要目的仍是通过参与非洲军事行动，支持苏联的非洲战略，并向苏联展示实力，以此在经济上寻求更多援助，并在政治上争取独立自主。这一点在古巴外交政策顾问给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备忘录中得到证实，该备忘录指出：“古巴对内图当局请求的回应将令我们最亲密的盟友苏联感到高兴。同时，这也将向莫斯科展示我们独立推动国外武装斗争的能力，这是我们与苏联关系中的重要筹码。”^⑤

尽管古巴与苏联在非洲政策的最终目标和实施路径上有所分歧，但无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苏联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以及军事上的强大生产能力和投送能

① 数据来源于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署，详见 U. 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1967–1976,”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1978, pp. 157–159; U. 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1971–1980,”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1983, p. 117.

② 1972 年 7 月，因不满苏联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拒绝向埃及提供实质性军事支援且多次试图干涉埃及内政，萨达特总统宣布终止苏联 1.5 万名军事顾问的任务，要求他们在一个星期内离开埃及，苏埃关系严重恶化。详见 Karen Dawisha, *Soviet Foreign Policy Towards Egypt*, Macmillan, 1979, pp. 71–82.

③ 《古巴加紧实行国家生活军事化》，《人民日报》1979 年 1 月 25 日，第 6 版。

④ Odd Arne Westad,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p. 176.

⑤ Abraham F. Lowenthal, “Cuba’s African Adven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 No. 1, 1977, pp. 6–7.

力，古巴这一军事工业体系不完整的小国，将难以在非洲大陆多个冲突热点维持数万人的军事存在。因此，古巴在非洲实际上扮演了苏联军事代理人的角色，其军人凭借对苏制武器的熟练运用和丰富的游击战经验，在非洲军事行动中取得较好战绩，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非洲迅速扩张的重要倚仗。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在非洲难以找到如此忠诚且富有战斗力的盟友，因此在与苏联的争夺中处于不利地位。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政策的利与弊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在非洲大陆实施了一系列扩张策略，成功地将部分非洲国家暂时纳入社会主义阵营，并为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与经济独立提供重要支持。然而，从经济成效和国际声誉的角度来看，苏联所付出的代价与其所获得的收益并不相称，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非洲受援国在后续发展过程中，也因苏联外交战略的影响而陷入政治动荡与经济衰退的困境。因此，对双方而言，苏联在非洲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呈现出弊大于利的态势。

从有利方面来看，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外交政策的调整，促进了非洲受援国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进程。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军事援助大幅增加以及军事顾问人数扩充，这些举措对处于独立战争决胜阶段的葡属非洲国家赢得最后胜利起到重要作用。^①此外，苏联通过与非洲友好国家签订长期的《友好合作条约》，为这些新独立国家提供稳定的资金与技术支持，这无疑为它们实现初步工业化和经济自主奠定了经济和技术基础。在国际层面，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在非洲的力量，也提高了苏联在非洲的国际影响力。

然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政策始终聚焦于同西方阵营的地缘政治较量，非洲国家的正当权益从来不是苏联决策的首要因素。为促使非洲国家遵循其全球战略布局，苏联实施了一系列干预他国内政、激化地区对抗的行为，这不仅对非洲国家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也给自身带来负面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一）对于非洲而言，造成长期的安全动荡，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

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苏联对非洲的干涉、渗透与颠覆活动，致使该地区一些国家长期陷入地缘政治的纠葛之中，安全环境显著恶化。特别是苏联在非洲之

^① Natalia Telepneva, *Cold War Liberatio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Portuguese Empire in Africa, 1961 - 1975*, pp. 101 - 137.

角冲突中两面三刀的行为以及在安哥拉内战中煽风点火的做派，让非洲国家逐步认清了其对非政策霸权主义、利己主义的本质。苏丹总统尼迈里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曾就非洲安全问题发表评论：“真正的危险是，超级大国利用一些非常孤立的冲突事件，作为它们加剧和扩大对非洲军事干涉的借口。目前我已看到的是，一些国家甚至强国，即古巴和苏联，带着军事装备和军队，声称来帮助非洲人。”他接着说：“我认为，苏联这样在军事上介入非洲是错误的，势必把非洲变成超级大国冲突的重要场所。”在谈到非洲之角问题时，他认为，“苏联人介入使整个事情更加复杂化。我深信，如果别人不来干涉我们，我们这个大陆上的问题就会容易解决得多，为解决这些问题所付出的代价也会小得多。”^①

面临苏联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冲击之余，非洲国家还深受苏联模式僵化的影响。由于忽视自身实际情况，这些国家被迫采取以举债为手段，优先发展重工业或特定产业的政策，以融入苏联的经济体系。然而，这种错误政策不仅导致国家经济和民生长期得不到改善，而且原本有望发展的产业也大多因资金、管理和技术的匮乏而逐渐荒废。当非洲国家认识到政治上过度依赖苏联、发展上机械模仿苏联模式无法引领国家走向现代化时，它们纷纷摒弃了社会主义，转而探索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因此，苏联在非洲苦心打造的势力范围最终只是短暂的繁荣，无法长久维持。

（二）对于苏联而言，壮大了相关的利益集团，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局势紧张与不稳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滞缓了其产业升级进程

苏联在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过程中，过于侧重自身利益，不顾非洲国家的实际情况；仅仅追求短期利益，缺少长远的战略考量，不仅极大地损害了自己长期以来在非洲树立的反殖民主义先锋形象，更为严重的是，它采取的以军火为先导的对非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军工复合体集团，并催生了一批通过非洲外交或情报工作发迹的所谓“国际问题专家”。这些专家在利益驱使和思维惯性下，拒绝针对难以为继的非洲政策作出任何实质性调整，从而导致苏联对非政策顽固地坚持错误方向，并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苏联在非洲的持续扩张引发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阵营的警惕。为应对此局势，美国采取一系列举措，以增强自身在非洲周边地区的地位，从而达到制衡苏联在非洲影响力的目的。这些举措包括缓和与巴西的关系，巩固在中东的优势地

^① 《西亚德总统和尼迈里总统揭露苏联干涉非洲 警惕苏联颠覆阴谋 坚决捍卫国家独立主权》，《人民日报》1978年7月3日，第5版。

位, 以及深化与印度的合作, 从而在广泛的地缘政治格局中遏制苏联在非洲的扩张态势。^① 同时, 美国明确向苏联表达了对其在非洲扩张行为的关切, 指出这一行为将对美苏关系的整体氛围和在其他领域的合作产生重大影响, 如当时正在进行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第二阶段。^②

从短期效果来看, 苏联的扩张主义政策在非洲似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它几乎打通了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社会主义走廊, 并通过在非洲之角的活动有效控制了红海这一亚欧航运的战略要冲, 极大地限制了西方阵营在非洲的影响力。但就长远效果而言, 苏联在非洲的强势行动加剧了西方国家对苏联的防备与不信任, 其参与各类和平谈判的诚意也受到质疑, 进而使苏联失去了一次缓和国际局势的重要机会。

在国际紧张局势未能缓和的大背景下, 苏联面临严峻的经济压力, 不得不将大量资金投向军备建设, 以维持庞大的军队规模和新式武器的研发。此举加剧了苏联财政的紧张状况, 使其本就脆弱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失衡。尽管苏联在与非洲国家的军火交易中取得了一定利润, 但这些利润大多被重新投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由于盲目地与美国进行军备竞争, 苏联在经济实力远不及美国的情况下, 将军费开支维持在接近美国两倍的水平,^③ 这进一步压缩了农业和轻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勃列日涅夫当局将超过 85% 的工业投资用于发展军事工业,^④ 导致苏联在新兴科技领域, 如微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方面, 与西方阵营的差距逐渐拉大, 而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日常用品供应却处于日益紧缺的状态。1978 年, 苏联成为全球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 其军事经费占每年国民收入的 20%—25%, 与之对应的是, 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逐年下跌, 甚至出现停滞现象。^⑤

在冷战思维的驱使下, 苏联为维持其同盟体系, 在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地区投入巨额资金。相反, 美国已逐渐摆脱石油危机与越战泥潭, 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取得了对苏联的先手优势, 开启了新一轮战略扩张。1983 年, 里根政府针对苏联经济日益捉襟见肘的形势, 推出“星球大战”计划, 开始与苏联展开新一轮军备竞赛, 试图利用美国庞大的经济体量进一步拖垮苏联财政。这一举措对

① “Memorandum from Samuel Huntingt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p. 8.

② “Memorandum from Samuel Huntingt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Brzezinski),” pp. 16, 48.

③ 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主编:《苏联兴亡史纲》, 第 552 页。

④ 同上。

⑤ 张英姣、孙启军:《论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对第三世界扩张的后果》, 第 188—192 页。

苏联本就畸形的经济结构造成严重冲击，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结 语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的综合国力达到顶峰，在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占据一定优势，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也达到巅峰。应当承认的是，苏联为刚独立的非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支援葡属非洲殖民地的武装斗争，的确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对美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新老殖民主义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在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苏联对非政策客观上促进了两大阵营力量格局走向均势，并在政治上迫使美国与苏联就和平与裁军问题展开谈判，这对缓和国际局势有所助益。然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非洲外交政策的核心考量始终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因此苏联在加大对非洲援助的同时，也加强了对非洲受援国意识形态、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干预和控制，使它们逐步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接轨，成为与西方阵营对抗的前哨阵地。但是，苏联在非洲的扩张战略损害了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利益及战略安全，引起西方疑虑和警惕。尤其是美国开始怀疑苏联试图通过和平的表象掩盖其在非洲乃至广大第三世界的扩张意图，进而对苏联通过谈判缓解两大阵营紧张关系的诚意产生了怀疑。

非洲国家因生产关系原始、经济结构落后、教育资源不足，不宜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计划经济以实现经济自主，这一判断并非基于苏联领导人和非洲学专家的臆想，而是现实证明，与发展阶段不符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将引发纷争与混乱，导致发展停滞。正因如此，在苏联僵化的发展模式束缚下，一些非洲国家始终未能构建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机制，迫使苏联不断通过“输血”，以维持其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然而，由于当地管理人才匮乏，援助项目往往难以直接惠及民众，且多数最终荒废。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虽然增加了对包括非洲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投入，但是效果有限，反而加剧了苏联的财政负担，阻碍了产业升级，使其在新技术革命中错失先机，最终在国际格局中处于被动，为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责任编辑：贺杨）

since Erdogan's administration,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and contemporary outcomes of Turkey's African policy, and discusses its motivation, strategic significance and multiple challenges. The evaluation reveals that Turkey's Africa policy is coherent and constructivist, which have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Maintaining strong relations with Africa remains a key component of Turkey's future foreign policy. However, in the long term, Turkey's Africa policy faces risks of conflicting interests with other external powers, and is constrained by its own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he complex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ynamics within Africa.

Keywords: Turkey, Erdogan government, policy towards Africa, constructivism

Authors: Sun Mengqi, Ph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Durham University (Durham DH1 3HP); Li Yubo,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Durham University (Durham DH1 3HP).

An Analysis of Soviet Union's Policy towards Africa during the Brezhnev Era

Hu Bo and Li Peiqi

Abstract: Traditionally, the African continent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sphere of influence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powers. After World War II, although the Soviet Union was once skeptical of Afric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out of ideological dogma, it took a strategic interest in Africa along with the decline of colonial powers such as Britain, France, Portugal, and Belgium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African countries. During Brezhnev's rule, with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in order to occupy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the Soviet Un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ts military assistance to Africa, strengthened its political ties with Marxist-Leninist political parties and armed groups in African countries, and even directly intervened in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African countries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Nonetheless, in the Soviet Union's foreign policy at that time, the priority of relations with Africa was still relatively low, which was largely depended on the phased evolution of Soviet Union-West relations, becoming a chip in the game between them. This foreign policy based on opportunism and

utilitarianism not only intensified the turmoil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but also caused a huge burden on the Soviet economy and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leading to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Keywords: Soviet Union, Brezhnev era, policy towards Africa, geopolitics

Authors: Hu Bo, Professor of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Li Peiqi,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ombined Exclusive Maritime Zone of Africa: Ideological Values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Zhang Xinyi and Shen Zhongxiu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s blue economy, the African Union ha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bined Exclusive Maritime Zone of Africa. This concept aims to promote cooperation among the regional countrie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marine resources by balanc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vereign rights and the concept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sharing. Although this concept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practice, such as weak implementation willingness of various countries, the lack of a complete system, and insufficient legal effectiveness, its core concept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in global ocean governance. The Combined Exclusive Maritime Zone of Africa provides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China – Africa maritime cooperation, especiall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o address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through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This study not only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African ocean governance, bu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epening of China – Africa maritime cooperation.

Keywords: Combined Exclusive Maritime Zone of Africa, the African Union, African marine governance, China – Africa maritime cooperation

Authors: Zhang Xinyi, Research Assistant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Shen Zhongxiu,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